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

——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

钱 民 辉

内容提要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研究源于教育社会学家对于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关注。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工作职位、人际交往也都要求教育程度。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作用，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由于现代社会存在着分化和分层，教育不但能促进社会分化，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证明，教育确实能使人们向上社会流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教育系统与劳动领域的筛选、训练以及个体在成人职业、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密切相关。实际上，取得成人地位的流动和非流动途径在教育系统内就已经形成了，教育系统的成层符合了社会分层。

关键词 教育机会均等化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文化屏障 再生产策略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存在着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这两个典型的社会特征曾是社会学最具有想象力的主题。所谓的社会分化，即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逐渐分离成专门的部分。诸如，家庭的权力越来越多地交给了社会，特别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有了专门的托管机构和学校。学校教育根据分化后的社会要求建立起各种专门的学校，学校会将不同的个人经过筛选后送到社会中的一定位置。教育社会学就是专门关注不同位置的人是怎样经由教育插入的，并安心于这一位置的，这关系到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中，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一、从社会分层的观点看中国的社会现实

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归功于那些关注社会中权力与结构的社会学家们的工作，他们用分层理论来说明和描述那些实质现象，如阶级、利益群体、地位、种族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①

有关社会分层的种种奠基性主张关注的是从封建式的不平等体系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体系过渡。马克思曾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日渐划分为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所追随，论证了教育与阶级的关系。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教育机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它从根源上维护了现在的阶级状况。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韦伯也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个阶级，他们是：（1）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越是成为整体，工作也就趋于自动化；（2）小资产阶级；（3）缺乏财产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各类白领雇员、公务员等）；（4）凭借财产和教育获得优势的阶级。^② 韦伯的分析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大多

数，这也是美国所标榜的中产阶级是社会走向民主、富裕的保证。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除了家庭因素外他们依靠的是成功的学校教育，因为美国学校教育的价值也与中产阶级的价值类似，高等教育机构似乎也就成了生产“中产阶级”的场所。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控制了教育并使教育成为他们再生产的场所呢？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继承了韦伯的传统，集中分析了教育是如何使一些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他认为教育也像是一个竞技场，最初时，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这样，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作为促进他们自己的目的——主要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一种方式。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在他的书《文凭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里，他进而引用了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③当社会中这些教育证书持有者越来越多时，他们的资源和势力已经使高地位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并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这就是教育为何成为中产阶层再生产的场所的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在西欧许多国家中都存在着，高等教育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在中国，上大学似乎越来越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高学历”与“好职位（高收入）”挂起钩来。在还不富裕的社会，教育作为成本的投入，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最沉重的“包袱”之一，从小学到大学，如果顺利的话，一位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还多。贫困地区的家庭一般是供养不起孩子上大学的，那么，他们的孩子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获取低的劳动报酬。

中国社会的分层状况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所谓“三大差别”已经被更多更大的差别所取代。仅从收入看，现在社会可以大致地分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需救济群体。据有关人士调查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失业问题近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步扩大。还有，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2.4%，20%低收入户则仅占6.5%。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8.74%的富裕家庭拥有60%的金融资产。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显示：在农村，至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的比重也高达55%，而占农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在高收入人群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者甚至更高。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数千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他们成了“需救济群体”。^④

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中间阶层呢？其实仅根据收入情况居于中间阶层者比例非常低，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阶层。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中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的分层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城市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而且利用好的政策和发展机遇迅速暴富起来。他们很多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而且蔑视学校教育对经济的无用。他们的行为和效果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以至于在教育领域又一次刮起了“读书无用论”风潮。直至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迅速暴发起来的企业商业资本拥有者开始陷入困境，一些人士称他们为“长不大的个体户”。这是因为社会形态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经济，教育的作用才被民间重视起来并予以了重新评估。从现在的趋势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助于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社会流动的资本开始由社会的向文化的转变。但是，到现在近十年的发展为什么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呢？

尽管有许多人视自己为中产阶层，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中产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身所具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

和社会意识。在我国，具备这样条件者还不足以以中产阶层自居，因为他们为数不多，暂时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层。为什么中产阶层难以形成呢？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加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种“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过多地垄断着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层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就目前的趋势看，维持“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被抛进贫困人口之中。^⑤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社会分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多数的社会资源，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知产阶层。他们大多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中产阶层，而是作为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阶层也有着诸多的分化，一些人通过自身的资本、工作成就和机会很可能会接近或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或与总体性精英阶层联盟。一部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创作，成为知识经营者，有较高的收入，他们会以中产阶层自居。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靠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倾向；^⑥（3）平民阶层。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大，大多数人基本是靠国家工薪生活的。由于社会中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所以在收入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些人是个体户维持着“长不大的”企业和商业过活。另一些人可能是靠着退休金过活。这个阶层在生活质量方面不能说过得很好，但基本能达到“温饱”水平；（4）需救济阶层。社会学者分析这个阶层是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后果，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生活处在贫困状态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就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现在城市贫困群体越来越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者。^⑦他们的生存主要靠国家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救济，也有一些人靠卖艺为生，另外有一些人成为流浪者和乞丐。

上述四个阶层基本是隔绝的，如果除了社会地位、权力和经济因素不论的话，从文化角度去分析也许能恰好地描述阶层封闭现象。阶层封闭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化屏障”，文化屏障并不是主观的，更多的方面来看，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阶层间的封闭是“文化屏障”的作用吗

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阶层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社会事实。各阶层之间的分界随着收入、地位和消费意义的差距加大，一种明显的阶层界限建立起来，并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与排斥作用。其中“文化屏障”逐渐成为各阶层外显的与隐藏的分界标识，或者是一种“文化符号”，你没有这个阶层的文化符号就不能进入这个阶层，同样，没有与你一样的文化符号你也不能认同他并与他建立起关系。如果非要给文化屏障下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这样尝试着描述，所谓的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文化屏障——使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文化屏障有时是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阶层保护，有时是以隐藏的方式排斥其他阶层的接触。

上述对文化屏障的定义并非是作者无根据的杜撰，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已经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现象，只是对这一现象的表达或描述的话语方式不同。

梅塞尔（Meisel）认为社会存在着两大阶层：精英和非精英或大众（mass）。精英是一个与其人数相比特别有权发号施令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有着三个核心要素（也称三C）：（1）群体意识（consciousness）——精英成员必须自觉地意识到精英的存在及自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2）凝聚力（coherence）——个体成员的行动必须与群体利益的诉求相一致；（3）共谋（conspiracy）——成员间

必须要有信息交换，共同的策略必须不断演变，以增进群体利益。^⑧这三个核心要素已经构成一种阶层的“文化屏障”，从而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即使高等教育给予了一些人具有了向精英阶层流动的文化资本，但要想真正进入这个阶层，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准和要求，一旦被精英阶层所接受，那么他就一定要具备这一群体的三个核心要素。

在现代社会中，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这除了经过一定的教育途径获得外，还需要有特定的阶层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的消费。作者曾就文化资本而论，认同自己作为知产阶层，但不足以是中产阶层。这个社会现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作为知识分子显然是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尊重的。当知识分子以进入精英阶层为目的，而不断接触精英阶层时，他首先感触到的是如何打破他与这个阶层的“文化屏障”。大家都知道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的主人公于连，他为了进入上流社会，从而学会上流社会的人的礼仪、举止和穿着，学会与上流社会的人交流，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经过了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妇人引进，他也就顺利地进入这个阶层，通过他所表达的文化符号和行动，从而获得了这个阶层的认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就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要进入“精英阶层”不仅仅要具备于连所要获得的那些资源和条件，他还要有与他们相当的经济资本和消费习惯。比如，当你进入到这个阶层时，或参加他们举行的活动，他们的穿戴可谓都是昂贵的“名牌”，即使你能花上万余钱配置你的行头，但你却不能与他们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他们邀你参加会员费不菲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某些健身俱乐部，你恐怕就不得不听而却步了吧。当你与他们在一些活动中交谈时，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你的学问，而你又想进入到他们的阶层，于是你不得不顺着他们的话题谈些经历和想法。如果他们谈到国外的经历，谈国外的消费和游玩，那么你就只有听的份了。如果他们都是“宝马”车俱乐部成员，你就更别沾边了。你要是个女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活动，很可能你一进去，就会被这个阶层的女贵族们认出，你不属于他们这个阶层。他们只要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味就知道是价廉物美的，看看你的穿戴和首饰就知道你的消费文化水准和基础，这样他们不会主动与你交往的。你作为知识分子，同样感到他们缺乏与你对话的基础和条件，他们其实也不能融入你的阶层。这种明显的阶层分离现象就是“文化屏障”的作用。

阶层文化屏障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成人社会中，就是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分层的现象。作者曾经在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作过研究，在参与活动时，作者突然发现了一种现象。孩子们在选择伙伴时并不是随意的，他们总是选择与他们家庭相似的孩子作为伙伴。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专门观察和分析这种现象。注意看孩子们玩什么，说什么。一些孩子来自富裕家庭，他们的父母大都是经理或企业成功人士，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哪些衣服是名牌，哪些玩具最流行，什么书最好看，哪里的餐馆菜好吃，哪里的游乐园最好玩。这些孩子在一起有交流、有共同的话题和感受。这时，若是一位工薪阶层的孩子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明显的看到这些孩子有一种“歧视”的表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孩子，他们都会七嘴八舌地说，他傻，他连游乐园都没有去过，我说的玩具他不知道也不会玩，他爸爸每天骑自行车接他，我们都是坐汽车回家。这么小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我感到吃惊，但仔细一想也难怪，孩子们说的其实是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当然，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是不同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由于各自带着自己家庭的生活习惯和象征，在一起必然会找能“说到一起”的伙伴了。看来，经济资本是区分贫富家庭的基本指标，那么，文化资本则是不同阶层的象征。文化资本不仅在一代人身上发挥作用，它还有继承性和再生产的功能。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总是通过文化资本来表达和再生产的。

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关注过文化屏障现象，并试图证明文化资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像上剧院看演出、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报纸之类的实践活动，在人口中的分布都是随不同阶级而定的。这种分布可以还原为教育成就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参与文化实践的能力是在教育经历中获得的。情况似乎是特定的文化实践被符号化，从而只有那些可以解读这符号的人才能获得这些文

化实践，而解读的钥匙又是通过教育授予的。教育的钥匙的分布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布迪厄认为，只有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即有品位的家庭的人，才能获得这把钥匙。为此，布迪厄区分出三种品位圈：合法品位（Legitimate taste）、中产阶级品位（Middle-brow taste）和大众品位（Popular taste）。^⑨

布迪厄在文化屏障与教育的作用之间作了分析，他确定了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使其处于上位（superordination）的位置合法化。而从属（subordination）阶级的成员不仅受到物质方面的约束，在高等教育的机会面前也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不平等体制的种种事实也因此得以合法化。例如，尽管在商业管理中，大学文凭被认为是从事管理工作所必备的资格，但管理者的孩子进入大学修此领域课业的比例仍相对较高，教育系统有着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能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资本，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显然是越来越重要了。

由于教育具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并能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纯洁性。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贵族幼儿园”和“贵族学校”，这些教育机构都具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设施、有着高薪聘请来的“一流”教师。由于昂贵的费用早已把工薪阶层的孩子拒之门外，文化屏障在学校教育时期就开始发挥显功能，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他们除了提供最好的教育质量外，这些贵族式的教育机构还重在养成学生们的贵族气质和贵族意识。由于“贵族学校”的存在和教育质量的分化问题，一些所谓的教育家们开始提出“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商品化”的理念。如果教育真的推向市场，那么，对于大众来讲，真正的教育机会会越来越小，阶层分化将更加剧烈，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也就更加坚固和合法化。但是，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流行起来，教育对个人来讲，依旧具有逾越文化屏障的作用，国家对于教育的计划、支持和调控真正有利于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但这样做会威胁到“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利益，他们并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的情况时，便会动员他们所有资源，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将高薪职位作为稀少资源，从而加剧了高级人才对高薪职位的竞争。当人们看到高薪职位竞争的资格应当具有高学历时，导致了高学位热的现象，同时也导致了学位贬值现象。人才也就不得不“依次降格使用”，从而保证了“总体性精英阶层”的稳定，加剧了其他阶层的竞争和混乱。

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

正像上面提到的人们追逐高学位是为了获得高薪职位的目的，也由于有些人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了目的（不管机遇和比例），从而进入富裕阶层。于是，人们已经看到了教育水平确实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已经是密不可分。不同的教育层次使劳动力市场分成相应的领域，劳动力市场的用人标准以学历制定；而劳动力市场的用人信息又会及时传达给学校，学校将迅速作出反应，调整课程结构和专业方向，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当教育机构生产越来越多的文凭时，这时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显得紧张和微妙。最近几年，持有大学文凭的“待业者”越来越多，人们也似乎发现，教育仅提供给人们一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它的作用并不是像教育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个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社会环境、性别），而取决于其后天获得的特征，尤其是教育水平。

大家都知道，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除此之外，社会流动还有一种潜规则：获得高收入、高地位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今天，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

从性别来看，在可比水平，女生的失业率总是更高一些，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上升，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会减弱，但不会消除。在大学里，女生的学习兴趣还比男生高，因为对她们来说，没有文凭会加

大找工作的困难。就是这样，许多女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仍然面临着不平等待遇，许多用人单位限制招女生名额或根本不招，而男生相对于女生来说，有更多的被雇佣机会。虽然人们将这一事实解释为女生们集中在文学或第三产业职业教育而导致的相应结果。毋庸置疑，女生就业的一部分障碍来自于其主要定位在竞争激烈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持有学历的女生越来越多更加剧了竞争的程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社会出身环境对就业分配的影响略高于性别影响。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低微的青年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他们从事的多是社会阶梯中不受“重视”的职业，因此收入不高。社会出身对就业的影响会通过促进个体与职业环境的社会网络途径表现出来。在同样的教育水平，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的青年随着父亲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从事更加多样的职业，选择机会多，工薪阶层或贫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通过会考竞争招聘的公共部门，虽然招聘是公开的并面向社会的，但实际能被招聘的机会太小了。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似乎除了文凭以外，某些“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享用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获得某种工作也被人们所认识。这样，资本的运用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于是，真正的“再生产策略”被利用起来，也就是各种实践活动。“个体或其家庭通过这些实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保存或改善其遗产，并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在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在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①

上述情况说明了劳动力市场运作的一般情况，其实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贡献被忽视了。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不同人员的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涉及到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教育的选择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对此的研究一直是教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共同兴趣和主要关注点，也因此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内容，是教育社会学渐成为显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人们发现关于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有两种趋向并做了分析：^①

其一，机会不平等的减少是发展的一个功能。为了说明这一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共时性与历时性。在共时性的研究中，有关人士对1960年和1985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美与非洲的机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1960年和1985年的数据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不管年龄和性别如何，都出现了社会发展程度越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的情况。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对入学态度的性别差异都会影响学生进入学校的状况和入大学的动机强度。在历时性的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1960年和1985年的地区变化情况，并举了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美国于1940至1985年间根据不同性别和肤色所受到的不同教育水平的变化；另一个例子是法国于1962至1980年发生的关于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入大学的变化。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看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降低了，虽然还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情况的不平等现象，但总的趋势是降低了。

其二，教育水平提高反而增加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研究人员通过对法国、前苏联和波兰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业成就与他们的家庭社会背景（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的学业成就水平上，这种不平等也容易引起学生对继续学业的兴趣出现差异。对来自富裕家庭的14—16岁的高成就学生来说，在学校接受时间较长的教育是可以承受的，他们的家庭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如果在更高级水平的学业失败，拿不到学业证书或是无法进入更高级的教育机构（大学）学习，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和他的家庭所受到的打击比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和家庭要大得多。而社会背景较好的家庭的孩子则可以从家人、亲戚等社会网络中得到补偿和帮助，如转到别的学校、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到国外留学等。

教育选择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步骤,在学校教育的每一阶段都会有学生分流。在现实中,造成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分流现象不仅有经济和社会因素,还有智力水平、非智力因素、教育系统在每一教育阶段规模的控制和质量的要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成绩的评估方法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拨款政策等。

这样看来,教育确实对某些人来说有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教育可能一直采取的“过滤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把大部分学生过滤掉了,只留下少数人继续更高的教育,从而有可能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但是从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来看,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遇到了明显的就业困难,中等教育文凭持有者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常常是在最后接受服务,大部分人被流放到次要的位置。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文凭的相对贬值归咎于文凭持有者流量的增加。即使是这样,青年们不得不接受“不断延长的教育”,这样似乎能为个体提供一种躲避失业的不可争辩的保护。人们知道,文凭最低,排在“等候队伍”之尾的人将最后接受服务(他们甚至实际上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⑫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本,而成了就业或躲避失业的基本条件。人们一方面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经济吸收文凭持有者的能力”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又在考虑除文化资本外,还有哪些资本是向上社会流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在一个日趋复杂和分化的社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就成了人们通向职业场所的“必经的”途径,而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惟一资本。

注释:

①②③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第351页,第239页。

④ 见布列克里局·杭特:《教育社会学理论》,李锦旭译,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417—420页。

⑤⑥⑦ 见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北京大学2003年11月首届“旅游业管理与开发”高级研修班(课程讲义)。

⑧ 见布迪厄关于组织化的文化偏好,转引自[澳]马尔科

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10页。

⑩⑫ 见玛丽·杜里—帕拉、阿涅斯·冯·让丹:《学校社会学》,汪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1页,第56—57页。

⑪ 这部分采用的材料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马冬玲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一文,该文专门介绍了英国学者 Roger Girod 在1990年出版的《Problem of Sociology in Education》一书的有关内容并做了分析。未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王永平